

经世济民

2004年 4月初稿，2005年 4月修改

摘要

经济，就是经世济民，其目的在国泰民安。

经世济民必需超越狭义的经济层面，去兼顾社会与文化层面；追求的是物质丰裕，社会和谐和精神文明。

经济有三阶层：富有，中产和贫穷。社会有三阶层：贤达，良民和刁民。文化有三阶层：精英，正人和败类。富有、贤达和精英很难创造；贫穷、刁民和败类很难清除。经世济民的上策是扩大中阶层。中产众，扶贫易；良民多，刁民敛；正人兴，败类绝。

中阶层的成长有赖人民的勤奋和聚积，以达中产；人民的向善和互律，以成良民；人民的自律和上进，以创造精神文明。这需要天时，地利，和人和的条件。

天时（气候）是政治与政策的稳定。

政治上最重要的是法制，切忌朝令夕改；法制中最关键是产权，切忌行政干扰。政策上最重要的是税制，特别是富有者应承担扶贫的责任。

地利（土壤）是支撑性的设施和措施，包括软和硬两类。

硬的是运输与环境。运输着眼在物流，人流和资讯的“方便”，重点放在空港。环境着眼在生产与生活环境的“健康”，重点放在排污处废，园林生态。

软的是治安与文化。治安着眼在“安定”，重点放在邻里基层组织。文化着眼在“文明”，重点放在传媒。

人和（滋养）是健全的教育。

在校技能教育要打破传统歧视。在职技能教育可由市场承担。

公民教育是培养良民、正人的不二法门。正规教育应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建设。非正规教育应强调邻里组织的抑恶扬善。

五项具体实践建议强调“四两拨千斤”的杠杆战略。

1. 以社会主义去补充市场经济：带头。
2. 开启税制以抑富扶贫：利诱。
3. 利用市场机制去建设社会：二十、八十。
4. 建设文化力量去推动精神文明：十五分钟。
5. 恢复民众组织去发挥自律、互律：一纸公文。

治大国若烹小鲜，不宜多动。市场，民众才是真正的主角和动力。政府可以起带头和协调作用。

本 文

这是作者经济三部曲的第三篇。第一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甚么”，第二篇是“可持续性消费经济”。

前言

经济，就是经世济民，其目的在国泰民安。

西方狭义经济的主题是，“什么办法能最有效地分配有限的生产因素去满足人类无限的物质追求？”答案是“市场竞争”。在实践上，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有结构性的矛盾——资本垄断与公平竞争之间的矛盾。这削减了市场经济的效率和加深了生产因素分配的不均。社会主义可以恢复一点市场竞争的公平，也可以提高一点市场经济（特别是以消费带动的经济）的可持续性。（见下文：实践 1.）。但是，市场经济本身也有问题。这个以个人为出发，以功利为目的，以私心为动力的理念未能反映人性的全面。结果只是物质发达而精神空虚和人际不安。

经世济民广义得多。它追求的是物质丰裕，社会和谐和精神文明。这些追求全面反映人性的经济、社会与精神层面，全面结合个人与群体、物质与精神的需要。以“无匮乏之自由”（物质丰裕）去恢复人的尊严；追求群体利益（社会和谐）去约束人的私欲；超越物质享受（精神文明）去提升人的素质。

中阶层

经济有三个阶层：富有、中产、贫穷。社会有三个阶层：贤达、良民、刁民。文化有三个阶层：精英、正人、败类。

在任何一个社会和时代里，富有、贤达和精英者不会多，也很难制造。一般的开发政策的焦点集中在消除贫穷、管制刁民、清除败类。这种从重症下手的战略往往高估了开发的能力，低估了问题的难度，多是徒劳无功或是半途而废。就算在发达国家里，这些都是棘手的

问题，不能根治。更重要的是，这种犯难的战略忽略了“开发”的真正意义。

开发是要把“大多数人”提升上更高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台阶。因此，焦点是“大多数人”所属的中阶层。上阶层的作为令人触目，下阶层的处境令人惊心。但上下阶层永远是少数，中阶层才是开发的对象、开发的动力和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中产多了，就有能力扶贫；良民多了，刁民就无所施其技；正人多了，败类就无处藏身。中产是致富的踏脚，社会贤达和文化精英也得有良民、正人去维护和表扬。因此中阶层才是国泰民安的基础，发展中阶层就是经世济民的任务。

中阶层的成长有赖人民的勤奋和聚积，以达中产；人民的向善和互律，以成良民；人民的自律和上进，以创造精神文明。这需要天时（气候），地利（土壤），和人和（滋养）的条件去培植。

开发中阶层，要特别抓紧开发中产。这不是说培养良民和正人不重要。那当然是重要，而且是与培养中产同样的重要。但这里不是轻重和先后的取舍，而是避重就轻的战略。

吃不饱，怎谈仁义。因此，精神文明必须建立在民生的基础上。相对地，饱暖会思淫欲，没有精神生活的富裕只是酒肉行尸。可是，社会意识和精神文明是要长时间来培养，而且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相对地，创造和积聚财富比较容易快速见效。而且，中产是经济的既得利益者，比较安分（相对于赤贫和暴富）。他们有保护既得利益的心态，比较容易导入良民和正人的行列。但同时，他们初尝经济果

实，往往徘徊于“思淫欲”与“知荣辱”之间，如不及早导入良民和正人行列，刁民、败类就有机可乘了。因此，战略上应该在全面开发中阶层之际，把焦点放在经济上，同时培养社会意识和精神文明。

1. 天时（气候）

政治与政策不稳定，人民便会“今朝有酒今朝醉”，钱花掉就算。这会带来一些繁荣景象，但是不能扎根的。同样地，政治与政策不稳定，企业便会“速战速决”，投资要尽快回笼。这会带来一些投机性的虚热，但是没有前途的。要政治与政策稳定，人民和企业才会作长远的打算，才会聚积（中产）、才会向善（良民）、才会自律（正人）。

1 政治上最重要是法制。

法制稳定，人民才有安全感，才会走正财之路（而不是行险侥幸）。法制最忌是朝令夕改。法制永远不会完美，总有缺点和漏洞，只要不危害大局，就不要改。刁民、败类处处有，法不能禁。给他们一个法制范围去宣泄，是避重就轻的做法。真正的解决是培育良民、正人。良民、正人多了，刁民、败类就不敢胡来。

法制中最关键是产权。¹ 产权有保障，人民才会积极聚积。产权最忌是行政干扰。行政干扰往往包藏着人和政治的因素，损坏了法制的公正和尊严形象。从长远和全局去看，行政干扰产权是得不偿失。

¹ 产权不单是私有权。它可以是各种形式和组合的使用、交换、出租、承继、馈赠、改变等权。因此，保障产权并不一定是资产的私有化，只是法定权益的保障。土地产权尤其重要。土地是不能创造（就算填海做地也其实只是把水底的地提高到水面上）。谁拥有，谁就可以垄断。因此，土地国有必须维持，只能出租（租期可以长些，但不能卖断）。

产权争执的正确处理是在法庭，不在衙门。

2 政策上最重要是税荷。

西方教训是税荷的担子全放在中产阶层（特别是受薪阶级）的肩上。这非常不公平。中国的中产阶层仍未形成，不能承受这种重担。税荷必得合度和公平（见下文，实践 2）。

经济三阶层是富有、中产和贫穷。成熟的经济中它们的比例约是 10% 70% 20%。穷人当然付不起税，西方的富人避税办法多，基本上不交税。70%的中产阶层也就得兼负起富者（10%）和贫者（20%）的税。在实质上，他们多负 $43\% \{ (100-70) \div 70 \}$ ，这是惊人的。象征上，富人不交税，穷人拿福利，只是辛劳的中产既交重税，又少福利，这是恼人的。西方经济剥削全球，它们的中产阶层又是温驯怕事，所以这现象还可维持。中国万不能行。

中国要鼓励人民上进和帮助他们聚积。因此，中产阶层的税率不能过高。最合理的就是富有的承担本身和贫穷者的税荷，中产的只承担自己的份儿。富有的多交税是公平的。中国的富者绝对是好胜的，他们的经济活动力不会因多交点税而下降。如果中阶层的税荷不过高，人民就会积极上进，聚积生财，以达中产。

地利（土壤）

培植中阶层要有适当的物质和社会环境。这些应是国家的政策和投资方向。

目前中国是全世界“烟囱经济”的一个最大的基地，也将是最

后的据点。未来的经济不再是廉价劳力和廉价资源的“烟囱经济”。新经济的消费方向很难揣测，但生产方向肯定是高技能（劳动力素质要高）、重信息（信息系统要广泛和紧密）、短周期（劳动力和企业的适应力要强）。我们要兼顾新旧经济去占据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位置，才可以有足够的空间和时间让中产阶层成长。

中产阶层将会来自各行各业的高质劳动力、经管人员和专业队伍，有打工的，也有老板。他们是现在经济的基础，也是未来经济的尖兵。要生财和聚积，他们需要支撑性的建设和措施。这些建设和措施可以由市场供应，也可以由国家供应（见下文：实践 3）。但是，有些建设和措施市场没有兴趣，如公园；或有垄断危险，如供水。这些就得由社会（通过政府或公共企业）去提供。下面提出的就是这一类的公共建设和措施。

公共建设和措施可分硬、软两类。硬的是物质条件，重点在运输与环境，作用是支撑生财和聚积。软的是社会条件，重点在治安与文化，作用是支撑良民和正人自律和上进。

1. 运输的着眼点是“方便”。

这是物流、人流和资讯的方便，是任何经济发展不可缺的条件。高质劳动力的成长与知识密集产业的发展有不可分割的互补互动关系。他们都要靠频率高和强度高的人际接触和信息交流去滋养。其中以空港为关键设施。空港不是奢侈，甚至小镇也要考虑。因为它是整个运输体的龙头，牵动其它运输系统（公路、铁路、水运等）；是“及时生产”的物流基地；也是这资讯世纪中人际交往的枢纽。一个区位

得宜、大小合度和与其它运输系统配套紧凑的空港，是开发地方经济的钥匙。就算时机尚未成熟也得及早研究和规划。空港相连的公路与铁路网络和空港周围的土地利用是经济转向的成败关键。

2. 环境的着眼点是“健康”。

这包括排污处废和园林生态。旧经济是“劳力追赶机器”，新经济是“资本追逐人才”。高质人才的市场价值高，流动性也很强。企业想罗致和维持人才，首先是提高工资。但如果整个经济都追逐他们，高质人才一定供不应求，提高工资是不够的。西方经验是高质人才除了追求高薪外，还追求高质生活，特别是生活的环境。市场经济或个别企业都不能，也不会建设一个全面性的高质生活环境（综合工业园也只是局部和片面的环境）。因此，新经济的企业和工人都会选择健康舒适的城镇去投资和工作。国家建设环境工程是吸引和维持新经济和高质劳动力的上策，也是推动生活素质和生产效率同步上升的上策。健康环境非但是手段，实在是经世济民的目标之一。

3. 治安的着眼点是“安定”。

社会安定有两个相关的现象，此消彼长。（i）安定才可聚积，聚积才会催生中产阶级。（ii）安定的反面是动乱，动乱会催生刁民、败类。警察、军队只能治乱，邻里守望相助才是真正的保安。社会的关系千丝万缕，社会的运作巨细无遗。什么都可以包藏动乱的根源，到处都可以是刁民、败类藏身之所。外在的“官员”怎可以处理这么多，了解这么细？城镇的邻里、乡间的村组才是关键的保安组织。一个邻里和村组的治安对每一个成员都有切身的利害；而每一个成员对

整个邻里和村组的治安都有直接干预的义务。这样，人民的互律和自律就成了社会治安的最佳保证。因此，建设和巩固民众基层组织是约束刁民和培植良民的长治久安上策。（见下文：实践 5）

4. 文化的着眼点是“文明”。

饱暖之后，就会有“思淫欲”与“知荣辱”的选择。把中产阶层导入良人和正人行列的过程中，文化的功能是扩大他们的眼界与视野和提高他们的理想与情操，使他们超越物质享受和个人利益。关键不在图书馆、剧院，而在于图书馆收的书，剧院上演的戏。小说和戏剧（包括电视、电影）在人民的精神生活中占极重要的地位，是传达道德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媒介。一般人对忠奸、正邪、美丑的分辨都是来自这些媒介的判别、评价、渲染和宣扬。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正派”的东西一定是闷人的“八股”。这是不正确的。很多正派而又感人的电影，如当年查理·卓别林的《大独裁者》和《摩登时代》都明认是宣传品。只要制作认真、娱乐丰富就有吸引，就是成功的宣传。为此，文化界，特别是传媒的组织、运作和管理，是支撑良民与正人成长的关键。（见下文：实践 4）

· 人和（滋养）

开发中阶层就得培养“人”。人的培养，关键在教育：制造中产的技能教育，和制造良民的公民教育。

1. 技能教育靠市场。

传统教育制度歧视技能教育。从前是学而优则仕，现在是学而优

则商。其实，中国需要技工更急切于商管和官员。从中学开始，政府应提倡技能教育。一技之长是达致中产的捷径。中学以后的技能教育可以交市场去干。市场对技能供求的信息灵通，反应也快捷。政府对牟利的技能学校应采开明态度。有些高层次的技能需要大学或以上的教育。但技能教育和人文教育（基础教育和素质教育）要分开。前者既有市场价值，而学生（顾客）也有选择权，应按市场经济原则处理。后者只有社会价值，应由国家支持。

2. 公民教育靠社会。

饱暖可以“知荣辱”，也可以“思淫欲”。中阶层可以被社会贤达影响，也可以被刁民煽动；可以学习文化模范，也可以跟随文化败类。公民教育是关键，可分正规和非正规两类，同样重要。

（i）灌输学生正确价值观是从小学到大学正规教育的使命。师表最重要。其它如校舍、教材设施都是其次。国家对好老师的表扬和奖励永不嫌过高，对坏教师的惩戒和处罚永不嫌过严。老师好，学生一定好。青少年的正面意识是公义与同情。公义意识容易被刁民、败类误导，引发青少年的冲动和破坏欲。同情最能发挥爱心和慷慨，引发青少年的社会热诚和建设欲。除了书本、传媒的教材外，国家应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扶贫、赈灾和各种基于同情的社会建设。

（ii）“非正规”教育更重要。其对象非但是青少年，是整个社会。基层的邻里组织是公民教育的主角。很多思想家指出，行为规范最好来自个人良知（自律），其次是来自社会监督（互律），最后才来自法律制裁（强制）。在中国近来已少见的里弄、街头的告示板上对

各家各户的褒或贬其实是很好的社会监督。这种强调自律和互律的民众组织是维持群体和谐、推广公民意识的好办法。西方人会觉得很怪异，认为揭人隐私是不道德。他们从纯个人利益出发的社会道德观跟中国从“大我”出发的社会道德观完全不同。我们不要因人家批评（或不认识）而放弃这中国特色和强项。良民和正人都是培养出来的。最佳的办法是抑恶扬善，最好的工具是邻里组织。（见下文：实践 5）

国泰民安

经世济民为的是国泰民安。那么，人民贫富与社会安危的关系在那里？

饥寒交迫使人丧失尊严。为求生存什么都去干，社会那得安宁？饱暖思淫欲，淫欲那有满足。营营役役，尔虞我诈，社会那得安宁？当然，贫富不均，尤其是富有者的骄奢，会激发社会公义情绪，也是社会动荡的因素。

看来，贫者可免于饥寒是社会安宁的下限。从国力去看，中国将快会达到全民温饱的阶段。扶贫赈饥是全社会的责任，但富有的应多负。这非但是他们能力所达，也是社会公义所需。社会公义是社会安宁的先决条件。税制是关键。（见下文：实践 2）

物欲与骄奢，都是社会不安的因素。物欲与骄奢的追求有没有上限？

西方的经济有“人类无限的物质追求”理念。这只是对了一半。人类永远在追求“比现状高的享受”，这追求是无休止的。但是，这

个“比现状高的享受”一般都在现状的边沿，不会完全脱离现状的范围。俗语说，“得寸进尺”，而不是“得寸进丈”。因为尺是在寸的边沿。在得寸的现状下，尺是进一步的追求对象；到了尺之后，丈将会是更“进一步”的追求了。追求永远都是“进一步”的。因此，追求虽然无休止，但是每一个阶段里的追求是有限度的，而这个限度是取决于当前的现状。这就是说，虽然我们不会知道多少的物欲才是社会安宁的上限（知道时可能太迟了），但是我们知道物欲享受的追求永远在现状的边沿。如果法律不准吸大麻，吸大麻就是边沿的追求。如果法律容许吸大麻，吸比大麻更厉害，而又是法律所不容许的东西就变成新的边沿追求。嫖、赌、饮、荡，声、色、犬、马，莫不如是。有人会这样说，这些追求，只要不犯法，是个人的事，谁都不用管。但是，个人的物欲追求除了是个人的营营役役之外，还有其经济与社会代价，需要全民负担的。拿上面的吸毒例子。瘾君子多，国家的劳动力和劳动素质就下降；他们容易生病，国家的医疗支出就增加；他们偷抢去喂他们的毒瘾，社会秩序就败坏；他们婚姻失和，家庭破碎，社会和谐就失调。

除了物欲外，还有骄奢的追求。物欲是追求官能的刺激，骄奢是追求情绪的刺激。权势、地位都是使人兴奋和陶醉的。骄奢的追求有时比物欲的追求对社会的影响更大。有了钱，就想有地位。旧社会有卖官鬻爵的制度。现代也有，例如西方有委员、协政、专员、使节之类的专为提升有钱人社会地位而设的玩意。如果金钱变成了社会地位的同义词，就有以下的影响。（i）有钱就有地位，鼓励“笑贫不笑娼”，

败坏社会的义节风气；(ii) 有钱可以买社会地位，社会地位的真正价值就下降，再没有人想以真才实学贡献社会；(iii) 有钱人炫耀买回来的地位，使人气脑之余，甚至转怒于政府。这些都影响社会安宁。

无论是物欲或骄奢的追求都是无休止的。每有得到，只会短暂的满足，跟着是更大的空虚。这只会做成苦闷（永不得的满足）和紧张（永不完的追求），只会滋养了刁民和败类。民不安，国怎能泰？

经世济民就得“节制”物欲和骄奢的追求。其实，有节制的享受才可以“常乐”。节制非但缓解社会的苦闷和紧张，也同时创造国民的文明精神。有四个相关的手段。

1. “征”。

通过税制，特别是个人所得税，去平均贫富。（见下文：实践 2 下限是最穷的都能得温饱（这包括穷人不用交税外还可得到救济），上限是绝大多数人不超越小康（收入不超过小康的人的税荷偏低，以鼓励勤奋和聚积；但收入超过小康的人的税荷会快速增加，以抑制敛财和暴富）。这是釜底抽薪的做法：削减可花于追求物欲和骄奢的金钱，并把它转向扶贫赈饥。

2. “禁”。

通过法制去管制骄淫。严禁变相的卖官鬻爵，和坚持对嫖、赌、饮、荡，声、色、犬、马的禁制，严禁之下仍有人冒犯，这是要接受的事实。但解禁是饮鸩止渴的下策，上策是在禁制之下加以疏导（见下文：导）。

3. “教”。

发动文化组织去宣扬超越物质享受的精神文明，和超越自我利益的公民意识。（见下文：实践 4）发动民众组织和社会舆论去表扬善行、节约，和批判骄奢、淫逸。（见下文：实践 5）

4. “导”。

食色性也，一定要有宣泄，正如一幢房子要有排污的下水渠。关键是下水渠放在厕所，不放在客厅。嫖、赌、饮（毒品）、荡绝不能公然试法。在暗地里进行，只要不影响社会大众的安宁和青少年的成长，国家宜采监视与围堵之策。通过学校和民众组织去发动扶贫赈灾和各种社会项目，把过剩的精力和多余的财富转移到精神文明的建设上。（见下文：实践 5）

钱，不能没有，但又不可过多。追求物质享受是开发经济的不二法门；节制物质享受是长治久安的必需条件。国泰民安有赖于追求与节制之间的平衡。

实践

以上谈的是战略方向，下面是五项具体的建议。

1. 以社会主义去补充市场经济。

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甚么”一文中分析了市场经济有效率的运作所需的基本条件，并提出拒抗资本垄断、保证公平竞争，就是“平坦的球场”的概念。文中强调，(i) 调控生产因素（也就是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回报率，尤其是资本的回报率，使其不超出合理的范围。这样，就会杜绝资本垄断，为市场竞争提供平坦的球场，

鼓励更多的人参与竞争。(ii) 提高生产因素的效率，包括创造新的生产模式，可使生产因素在竞争中人尽其才，物尽其用。(iii) 超越市场经济，把三个生产因素单独的互相竞争(“个别式”竞争)提升到三个生产因素之间先结盟组团然后互相竞争(“组团式”竞争)。“组团式”竞争既保存了竞争的原则，又发挥了生产因素之间的互补互惠。最后，建议“合作社”形式的经济组织作为实践工具。合作社是个“组团式”的经济组织，非但有经济作用，更可以成为民主制度的基石，是“大我”和“小我”之间的最佳桥梁。(详细内容可参阅原文)

另外，在“可持续性消费经济”一文，我分析了可持续的消费经济所需的条件，并建议扩大采用“合约使用”(去取代“买断、卖断”)的市场交易模式去促成“资源循环”以延长天然资源的可持续使用，和调节“供求循环”以保证生产与消费的可持续增长。(详细内容可参阅原文)

这些建议牵涉整个经济，不可能以行政手段去实践。但国家可以，也必须，发挥带头作用。在市场经济中，“顾客永远是对的”。政府是个大主顾，很多人都想跟它交易。如果政府(通过各部委、各层政府和各国企)在市场购买产品和服务时优先考虑“合作社”组织形式的供应者，优先采用“合约使用”的交易模式，那么市场一定会做出回应，会有更多人考虑去采用这类的经济组织和交易模式。当他们的和其他的观望者体会到这些经济组织和交易模式会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时，他们就会自动朝这方向走。这是国家利用政府本身的运作去带动整个市场经济的杠杆战略。

2. 开启税制去抑富扶贫。

贫富差距一定存在。如果贫的有温饱，富的不骄奢，社会仍会安宁。社会财富的合理再分配是关键，工具是公平的税制。

税与费有别。费是服务。从水费、电费、停车费，到保健、保险、养老与上学，受益者是个人。交的费与受的益应是对等的。税是支付大家的事情（例如国防、公安、环保和基建）和“再分配”（例如扶贫、救灾、开发落后地区等）。交税和受益没有关连。有钱的多交税，没钱的多受益。

从“再分配”的角度去分析，个人所得税是最合理和切实的税源。它既符合多收入多交税的原则，又是逃税、避税、瞒税漏洞较少的税种，应是公平税制的支柱。

没有人会自动捐献。税是要“征收的”。征收就要有凭据。西方国家最成功的是全民申报。关键是，怎样开动全民申报的积极性？

有人说大部分中国人收入低，无能力交税，这很对。但申报不是交税。如果收入不单是用作交税的凭据，也同时用作是拿福利与救济的证明，那么低收入的也就会积极申报。一开始申报，国家就掌握了个人收入的资料。今年收入少，明年收入会增加。这是中国大发展期的国情。总有一天，绝大部分国民的收入会达到交税的基数。

怎样发动收入较高的人积极申报？这关系到中国目前税制的一个缺口，也许是原则问题。“公平”的所得税应该是按收入与支出的差距征收，而不应只是看收入。两个人有同样的收入，一个人是独身，另外一个有家庭。有家庭负担的支出自然多了，交税的能力相对减少。

他的税荷也应相对下降。

一般来说，可以在收入中扣除的“合理支出”有两类。第一类是定额的生活支出。例如，每个人可以扣除若干元的“个人免税额”，和扣除每个未成年孩子若干元的“家属免税额”等。第二类是不定额的支出。例如孩子的学费、贷款买房的利息等，都是按实际支出去扣（很多时定下最高扣除额）。至于那些是可以从收入中扣除的“合理支出”将是政策的决定。在上面的例子，如果国家不鼓励组织家庭，那么，孩子的生活支出、教育支出等就不能在收入中扣除了。

目前，很多中阶层的所得税都是在工资内扣除，税荷完全按收入多少来定。申报不申报无所谓。但是，如果税荷是按收支差额而定，即是说，按合理支出多少而递减，那么，不申报支出就是愚蠢了。起初时，支出较多的人会比较积极申报，但如果“个人免税额”定得高些，它对税荷的影响就比较大了。所有人都会想在收入中把它扣除，以减低税荷。那么，申报的积极性就高了。一旦开始申报，国家就可以逐步追踪“灰色收入”。理由很简单，一个人的支出就是另外一个人的收入。如果人人申报支出，特别是不定额的支出，如学费、贷款利息等，就会有发票追查这些支出跑到那个人的口袋里。国家也可以利用“合理支出”的类和额去推行各种宏观政策目标：例如鼓励买房、鼓励教育等等。

申报是关键，有了申报就有凭据可以追踪。但是每人每年申报是个庞大的动员。西方已成习惯，中国可参考人家，但也要配合国情。下面是一些考虑。（i）抑富扶贫（包括贫富地区的平均发展）一定要

由中央宏观协调和调拨。因此，个人所得税应是中央的税，由纳税人直接交付中央。但在银行支票和信用卡制度仍未普及之前，现金支付的税款可由地方代收。(ii) 申报要简单，内容包括所有收入、所有合理支出、和收支差距。并按此算出应交的税款(也可能是不用交税)。申报表格和税款同时递交。申报是国民责任，任何法律、会计费用应自付。国家可设咨询，为低收入者填报。(iii) 整个申报程序建立于信用和自律。国家不可能审核每个人的申报，只能抽查。抽查样本只能是 1%到 2%。但查出作弊，必定重罚。(iv) 原则上每人每年申报。估计中国要花十年去建成这个制度，也就是平均每年增加 10%的人申报。开始时应避重就轻。可以从城市开始；从公务员、大企业雇员、专业人士开始；也可以分区域、分行业进行。

申报非但是国家税制的基础，也是财政计划、发展计划不能缺的数据。中国的税制必需要往这方向走，才得健全。按“全部”收入和“合理”支出的差额去核算税荷非但公平，而且可以诱发人民(贫与富) 申报的积极性。是个连消带打，化扰民为便民的上策。

3. 利用市场机制去建设社会。

国泰民安有赖健全的社会。因此，经世济民的任务应包括社会建设。

在社会建设中，健康和教育是基础建设。但是，中国的国情是国家再没有能力全部承担。很多医院、学校都“进入”了市场，按市场规律运作。在名义上可能仍是“公立”，但实际运作上是按本身的利益出发。虽然还是拯救疾苦和培育英才，但个别医院和学校的运作都

带上浓厚的“市场效益”考虑，脱离了“公共利益”的轨迹。既用国家的钱和政府或部委的名义，又收取各种名堂的费用和捐献。它们亦公亦私：既要向国家负责，又要向“股东”和“顾客”负责。结果是向谁都不负责：非公非私。这产生三个问题：国民基本需要失去保障，贫富不均鸿沟加深，和服务素质没法保证。下面是一个可行的变通。

国家虽不能承担全民的健康和教育，但有能力和责任去承担部分，特别是贫穷阶层。国家可考虑逐步从现在半公半私的健康和教育体制退出来，把有限的钱去设立和支持真正的“公立”医院和学校去满足大约 20%的需要，余下的 80%需求交给市场去干。这样，国家就可以集中投资，招揽一流的医生和教师，购置最佳的设备。

关键是这些公立医院将不是单收穷病人。谁都可以进住，是按病情、按次序。这些公立学校也不是单收穷学生。谁都可以就读，是按成绩、按才能。它们都不收费，而且是不能收费（杜绝有钱的买进）。这些精英（从素质角度去看）的公立（按国家投资和不收费的定义）医院和学校将会带出市场反应。

按市场经济规律运作的“非公立”（包括牟利和慈善团体）医院和学校（将是 80%左右）要与公立医院和学校“竞争”（因为有钱的都会想进入这些一流的公立医院和学校）。竞争的结果将是全面的素质上升，收费下降。产生的现象将是公立的医院、学校一律不收费，非公立的医院、学校各自按其提供的服务水平，收取高低不一的费用。贫穷的可以排侯进住一流的公立医院，或可进住收费较低、服务较差的非公立医院。富有的可以跟贫穷的排侯一流的公立医院，也可以花

钱进住一流的非公立医院，悉听尊便。学校也是这样。如此，贫者得到照顾，富者有了选择。起步时，国家可挑选名望高和影响大的医院（从诊所到综合医院）和学校（大、中、小学）。最好是分布全国，以收最大市场反应。

国家投资（可以直接经各级政府，也可以间接通过独立的基金）去满足 20%的需要是合度。多了负担不起，少了起不到引导市场作用，也不足照顾赤贫。凡是有市场的社会事业，如保险、养老等，只要没有垄断危险，都可以按这个 20%引导 80%的双轨发展战略，利用市场机制去建设社会。

4. 建设文化力量去推动精神文明。

推动精神文明，文化界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正派”的小说、电影、电视、音乐等不一定要是闷人的说教。它们可以是娱乐性高和吸引力强，甚至是赚钱的畅销品。经世济民的任务是培植这些文化力量。

国家花钱资助“正派文艺”往往有相反效果。“官办文艺”的官僚味一定重，娱乐性相对低。群众对“官办文艺”也多带猜疑，其影响力也就相对下降。其实，一般文化人最热切追求的不是钱，而是“知音”，也就是观众、听众和读者。文化人需要的就是与知音者接触和交往的平台和渠道。国家可以发挥杠杆作用。

举一个例。地方政府要求（可以立例规定，也可以出钱去买）地方电视台在每天的“黄金时间”内抽出 15分钟到半小时播放“文明”节目。节目内容经比赛选拔。参赛者可以公开，也可以特约；可以是

个人，也可以是组织；可以是成名的，也可以是新秀。节目评选委员会由政府、电视台和民众代表组成。选出来的节目制作费用由参赛者自己负担。播出后如果收视率高，电视台可以购买版权，也可以投资发展节目。这样，参赛者既要满足“正派文艺”的要求（由评选委员会决定），也要经得起“市场经济”的考验（由收视率和观众反馈决定）。这将会吸引很多文化精英，包括成名和未成名的，去参赛，因为成功了就会兼得荣誉、知音和金钱（电视台购买版权或其它商业资助）。如果比赛可以分地方、省和国家几级晋升，那就更有吸引力了。电视台也会乐于参与，因为胜出的参赛节目都是优秀作品（电视台也是评判之一）。而且电视台非但不用投资，还可以购买收视率高的制作，完全是无本生利的生意。

这个例子可以用在其它文艺上。国家（各级政府）可以跟出版商、电台、电影院、剧院合作去为“正派”而又有商业价值的小说、音乐、电影、戏剧提供平台和出路。对国家来说，利用市场机制去推动精神文明，是本小利大的杠杆战略。

5. 利用基层组织去发挥民众的自律、互律。

农村的村组和城市的居民委员会是中国特色的基层组织。近年因为与市场经济脱节而未能发挥其经世济民的作用，是很可惜的。这机制深入民众，可以用来发动群众力量去维持社会安定、围堵刁民败类、发扬大我精神、和建设文明社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底下，政府不能什么都管，什么都干。经世济民要靠市场、靠民众。

上文说过，社会安定繁荣一定要约束人性。良知的节制（自律）

最好，社会的监督（互律）次之，最后才是法律的制裁（强制）。有了法律条文和执法机关并不代表法治。如果人民不守法，那只能造成民与法的对抗，怎能说是“治”。“治”是安定。安定与不安定，决定于守法，不决定于执法。守法如果是出于害怕受罚，是不能长久的（有机会就不会守法）；如果是出于自律（精神文明）和互律（社会监督），就不会卸责，也不能卸责。基层组织是发动民众自律和互律的最佳保证。

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层组织是样子的？怎样去实现？肯定的是，“老大妈式”的街坊间帮，不合时宜。没有人尊重，也没有人需要。关键在尊重（权威）与需要（作用）。国家可以利用市场机制的自利和互利去玉成其事。

假如政府招聘、企业招聘、入学申请、银行贷款都要有“品格推荐信”，而推荐之中最被重视的是由村组和居委会签发的推荐信，那么，村组和居委会的推荐便有了市场价值。这会为村组和居委会带来权威。这一个利用市场经济逻辑去推动社会主义目标的战略的实践非常简单。一纸公文就够了。其余的都由“自利”和“互利”去完成。

从自利的角度出发，机关、企业想找好的员工，学校想找好学生，银行想保护借出去的钱。因此，他们都会想听取村组和居委会的推荐，尤其是品格上的评语，因为乡里与街坊对一个人的品格的认识是最清楚的。找工作、找学校和找银行的当然想提高被聘用、被录取、和被批准的机会。因此，他们都想获得好的推荐。这样，村组和居委会就起实际作用。村民和居民就会积极参与和组织。

从互利的角度看，声望高、权威大的村组或居委会对所有人都有好处，因为每个村民和居民（或他的家属、朋友）总会有一天需要拿推荐。他们所属的村组或居委会的声望越高、权威越大，他们拿到的推荐书的价值也越高。同样地，每个机关、企业、学校、银行在决定聘用员工、取录学生和批准贷款之前都想掌握申请者品格的可靠情报。声望越高、权威越大的村组和居委会所发的推荐书越被重视。

因此，在个别村民和居民的层次上，因为人人都想拿好的推荐书，每个人就会自我检点，和支持所属村组或居委会所举办的活动。这是自利驱使的自律。同时，因为大家想所属的村组或居委会的声望高，各个村民和居民就会互相监督大家奉公守法（包括领导层的正直无私），和互相鼓励参与活动。这是互利驱使的互律。

在村组和居委会的层次上，因为各自都想提高身价，每个村组或居委会就会加强内部纪律和扩大社会活动。这是自利驱使的自律。同时，因为大家都想维护村组和居委会制度被政府、企业、学校、和银行的重视，所有的村组和居委会就会互相监督各个村组和居委会的素质、和互相督促去提升这制度的社会地位。这是互利驱使的互律。

这些自利、互利和自律、互律的民众基层组织更可以作为政府与民众沟通的桥梁，协助政府发动民众力量去扶贫救灾、防火防盗、环保清洁和各种各样的精神文明或社会建设。它们会积极参与，因为这些功能和活动会更加巩固它们的地位和权威。

村组和居委会是中国既有的基层组织，大家并不陌生，很有潜力。国家可以首先利用政府和国企的招聘需要“品格推荐书”去刺激它们

的复苏。市场经济的自利与互利动机就会使它们脱胎换骨 ,成为自律、互律精神文明的发电机。

结语

治大国若烹小鲜 ,不可多动。市场、民众才是真正的主角和动力。政府只能起些带头作用或干点协调工作。本文谈到的都是利用市场机制和中国特色的“四两拨千斤”的杠杆战略。对市场机制 ,国家应辅之、补之 ,使其发挥最大经济建设功能 ;对民众组织 ,国家应教之、育之 ,使其发挥最大社会建设功能。

社会安定是因也是果。没有安定 ,不会有发展 ;发展的目的是国泰民安 ,就是安定。因此 ,长治久安是一种动态的安定 ,是物质追求 (富裕)与物欲节制 (文明)之间的动态平衡。这也就是经世济民的任务。